

书刊评论

《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中译本所存在的问题

——兼谈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

于铁军

因为撰写博士论文的缘故,近几年对关于美日同盟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著作、文章等比较留意。1996年以来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问题在中、美、日三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9年美国方面组织了一批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并于会将论文结集出版,于是便有了《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1]之后不久,日译本(节译本)面世。2000年春我从日本归国,在书店发现此书的中译本,当时心中可谓又惊又喜,吃惊的是国内出版界捕捉热点、译介国外著作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喜的是中文本还是全译本,而且,除了正文,连原书的注释和作为原书附录的一些重要文件也都悉数翻译过来,这对于一部学术著作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等回家之后慢慢翻看中译本,原有的欣喜之情很快便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忧虑。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感受,是因为《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以下简称《美日联盟》)一书的中译本存在大量严重的误译。为叙述方便计,本文将这些错误大致划分为以下四类,略加说明。

第一类为对原文的理解上的错误。比如,在中译本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通过这项文件,两国领导人试图说明由于前些年内出现的政策和安全危机而产生的美日联盟,在当前的政治和行动上具有更大的可信性。”(p. 1)美日同盟是因为前些年的政策和安全危机而产生的吗?查原文如下,“Through the document, the two leaders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alliance had emerged from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rises of the

previous year with even greater political and operational credibility.”(p. XI),这里的意思实际上是指,美日同盟已经走出了前一年两国之间出现的政治和安全危机,^[2]而并不是说美日同盟产生于此。

再如,序言第1至2页,“批准一些关键的美军军事设施返回冲绳和日本,确保美国的兵力;”整个句子令人费解。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怎么说是返回冲绳“和”日本呢?既然将“关键的美军军事设施返回冲绳和日本”,那还怎么“确保美国的兵力”呢?实际上,原文是“agreed to return key U. S.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n Okinawa to Japan while maintaining overall U. S. capabilities.”(p. XI),其意思很明确,应为“在保持美国总体力量的同时,(美日)同意将在冲绳的一些关键的美军军事设施返还给日本。”

又如,关于1909年美国提出的“满铁”中立化计划的失败,中译本为,“(美国)国务院官员把主要责任归咎于有关英日同盟中立化计划的失败”(p. 27)。这里的英文原文是,“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laid the major blame for the failure of the Neutralization Plan on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p. 25)意思是“国务院把‘中立化计划’的失败归咎于英日同盟的存在”。译者大概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原文的句子结构,结果张冠李戴。中译本的读者不明就里,读到这里肯定是一头雾水。

再比如,中译本第159页有一段话,“军事学确认美国支持亚太经济合作(APEC),但明确证明东盟地区论坛(ARF)于1993年成立,1994年6月作为美国挑选参加‘亚洲首次安全问题扩大协商机构’的候选人而第

一次召开大会。”(p. 159)这一段讲的是发表于1995年2月的“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中涉及亚太多边安全对话的内容,但这段话实在是让人读不懂。查其英文原文为,“The strategy confirms U. S. support for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but explicitly identifies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formed in 1993 and first convened in July 1994, as America’s chosen candidate for ‘Asia’s first broadly based consultative body concerned with security issues.’”(p. 145),译成中文应该是,“该战略确认美国支持亚太经合组织(APEC),但它明确地将成立于1993年,并于1994年7月召开首次大会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作为美国选定的‘亚洲第一个关于安全事务的基础广泛的协商体’的候选者。”

上述类型的错误在《美日联盟》中译本一书中数量最多,对理解原书所造成的障碍也最大。这类错误大多出现在中译本序言和第一、二、七、八、九、十章,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造成错误的原因看来主要还在于译者自身对原文的理解不够透彻。

第二类为在日本人名、地名的翻译方面所出现的错误。大家知道,和汉字一样,日语当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如果单纯按照罗马字拼法来还原日本的人名、地名,十有八九会出错。因此,在从英文转译日本的人名和地名时,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人名和地名外,必须借助于专门的工具书,如《日本人名词典》和《日本地名词典》之类。遗憾的是,《美日联盟》一书的译者只是在一部分人名、地名之后附上英文表达,却没有花力气去查证各种工具书,来搞一一对号入座。其结果可想而知,书中这方面的错误比比皆是,而且所出现的错误中有很多是了解日本政治的人所应该知道的人物和地名。比如说,中译本将现任冲绳县知事稻岭惠一误译为“印南圭一”(p. 240),将著名学者佐藤诚三郎、西原正、丸山真男、都留重人和北冈伸一分别误译为“佐藤清三郎”、“西原正志”(p. 163)^[3]、“丸山正雄”(p. 209)、“都留成人”(p. 181)和“北冈信一”(p. 156、p. 179),将《朝日新闻》著名记者船桥洋一误译为“舟桥洋一”(p. 165),将明石康错译为“石也寸之”(p. 164),将卢田均误译为“足田仁史”(p. 210),等等。甚至连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也一度被译成“本广西川”(p. 21)。

在地名方面,中译本误把对马岛错译为“马岛”(p. 25),把指代日本政界的永田町译成“长田”(p. 207)。^[4] 驻日美军基地中,厚木空军基地误为“原

木”(p. 129),上瀨谷误为“神权”(p. 130),普天间误为“富腾马”(p. 132),嘉手纳误为“卡登纳”(p. 133),瀨海波误为“生那哈”,楚边误为“索别”(p. 134),等等。可以想见,如果中译本的读者拿一本世界地图或日本地图,在上面查找中译本所给出的那些美军基地名,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第三类错误是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而导致的专业术语的乱译、误译或干脆不译。比如将军事“投送力量”(projecting power)误译为“发电”(p. 142),将国际军控“机制”(regime)错译为国际军控“政权”(p. 200)。在译者的笔下,北朝鲜发射的“劳动”(No Dong)和“大蒲洞”(Taepo Dong)导弹成了“诺洞”(p. 186)和“大波洞”导弹(p. 201);“和平主义”(pacifism)成了“消极主义”(p. 206、p. 207);“极端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成了“超民族主义”(p. 209);美国的国防部长(Secretary of Defense)成了“国防部秘书”(p. 187);日本的“国会决议”(Diet Resolution)成了“食品决议”(p. 299);1989年日本发生的“里库路特丑闻”(Recruit scandal)成了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征兵丑闻”(p. 234);证券业被译成“安全工业”,而英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大爆炸”(big bang)则成了伦敦的“大本钟”(p. 244);“阪神大地震”也另有了个洋名,叫“汉森地震”(p. 175);由于把“满洲”误译为“满洲里”,因而也便有了“位于满洲里南部的辽东半岛”这样的咄咄怪事(p. 23)。而对一般具有国际关系常识的人来说都不感困难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Taft-Katsura Agreement)和“罗脱—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以及在日本享有盛誉的重要杂志《文艺春秋》和《中央公论》等,译者也无力争出,只能照搬英文原文应付了事(分见 p. 25、p. 234、p. 222)。

第四类是由于粗枝大叶和学识不足而将原本正确的时间、地点、数字甚至简单的词汇搞错。如将1994—1995年的“奈倡议”的时间误植为1944—1945年(p. 142);将迈克·望月1995年的著作《日本:国内变化与对外政策》误译为1955年的“日本:民主变化与对外政策”(p. 162);日美两国签定旧《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时间本来是1978年,中译本误为1987年(p. 354);英日同盟解散的时间是1921年,中译本误为1912年(p. 27);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同盟再定义的重点是从《美日安全条约》的第五条转向第六条,即从以防卫日本本土为重点转向以防卫“周边事态”为重点,

中译本错为从“第四项转向第五项”(p. 38)。日本参加联合国选举监督活动的志愿人员中田厚人(书中误译为仲田厚仁)的被害地点本来是柬埔寨,中译本中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保加利亚(p. 169),而且译者似乎还一直相当执著地认为,日本参加的是联合国驻保加利亚临时权力机构,而不是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p. 164)。凡对国际时事和日本外交稍有了解的人是很难犯这种错误的,试想,联合国什么时候在保加利亚设立过临时权力机构?日本又什么时候参加过联合国在保加利亚的维和行动?至于把“tradition”误当“trade”而译为“贸易”(序言, p. 8),把“ordinance”误当“ordnance”而译为“大炮”(p. 17),把“eager”误作“eagle”译为“鹰”(p. 232)等等低级错误,就更有说不过去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美日联盟》一书的中译本是一部存在严重缺陷的译作。一部本来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被以这样的面目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确让人感到遗憾。“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之告诫,对于《美日联盟》一书的中译本来说,看来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套话。

《美日联盟》中译本的问题所折射出的是近年来学术著作翻译的质量问题。目前坊间所售书籍中翻译类书籍占相当大的比重。就笔者十分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其中存在的问题令人堪忧。选择国外各领域中的优秀著作予以译介,对于推动中国学术有不可替代之作用,我举双手赞成。但如果译文质量得不到保证,则不仅空耗人力物力,且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甚至误导读者。以笔者之管见,为保证译文质量,下列做法是值得提倡的:

其一,学术性和专业性比较强的书最好由相关领域内的专家来翻译,至少要做到在翻译完之后请该领域的专家审核、校对一下,把一把关。现代社会和学术的分工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一位译者,即使其外文有很高的造诣,如果要其翻译他不熟悉的领域的东西,也肯定是事倍功半。而专家译书,则无形中会使译文质量得到一定的保障。试想一下,如果《美日联盟》一书在付梓之前请专家校阅一下,则情况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其二,译者应不断加强自身的学术修养,恪守职业道德,努力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任何译者,囿于其自身学识的局限性,再加上有时语言的不可译性,翻译时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译是很难避免的,甚至可以说

是很正常的。作为译者,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多充实自己,多方查证,仔细推敲,尽量减少错误的发生。

笔者也曾做过一点翻译工作,对翻译工作之艰辛有切身的体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别人的著作比自己写书还要困难。自己写书,不了解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绕过去不写,翻译却享受不到这种奢侈,原文白纸黑字摆在那儿,不管你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好歹你都得给译出来。而一旦译作摆在读者面前,译文是否准确,是否通达,是否典雅,便只有接受读者的评判了。几年前,笔者在翻译原美国驻日本大使阿马科斯特的《朋友还是对手》一书时曾碰到一个日本经济术语,英文叫做“lean production”。由于当时手头没有此书的日译本,而翻遍各种辞典,咨询了数位专家,仍然不得要领。盖查《英汉大词典》,知lean有“倾斜”之意,而《日本知识词典》中又有“倾斜生产方式”的词条,指的是战后初期日本实行的通过重点投入来开发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产业的政策,因此我便率尔将“lean production”译为“倾斜生产方式”,而且还作了译注。^[5]后来日本学习,才知道“lean production”的日文汉字是“筋肉质生产方式”,指的是一种高效、精干的生产经营方式,我在书中的译法是一种典型的误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更慎重一些,多存些疑,搞清“倾斜生产方式”的实行时间,或者多征求几位专家的意见,也许这个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同样,《美日联盟》的译者如果能认真一些,中译本中的许多错误本来也是可以避免的。

其三,大力鼓励专业人士撰写相关译著的书评。高质量、高水平的书评无论是对于维护学术规范,打击粗制滥造,还是对于促进学术积累,维系学术的薪火相传都是一条不可或缺的途径。那种认为翻译不是学术,书评不是学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6]就拿世界上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那些一流的学术刊物来说,哪一本不是书评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美国《世界政治》杂志上的书评论文常常都是邀请最优秀的学者来撰写,同时也是最能引发读者兴趣的栏目。对于译著的健康批评,将从外部制度上为译文的质量提供保障,同时,同行之间的经常切磋也会使译者和批评者双方获益。

翻译不易。我国许多有成就的翻译家也必定是有成就的学者。关于翻译的艰辛和其所需要的严谨,翻译大师严复的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可谓最好之

写照。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老前辈陈乐民先生也慨叹“难哉译事”,并“希望译者们都学习巴金、朱光潜、杨宪益诸先生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每译一本都当作一个事业去干,则译林幸甚,读者幸甚。”^[7]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值得每一位译者铭记。

[注释]

- [1] 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所使用《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的版本分别为: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中译本(华宏勋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 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日]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日美同盟:美国的战略》(川上高司监译),劲草书房,1999年版。本文中括号内的页码除特别指出外均为中文本之页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现在在讨论美日军事关系时一般采用“日美同盟”或“美日同盟”的提法,而不是“美日联盟”。
- [2] 指1995年由于驻冲绳美军士兵强暴日本少女事件而给美日同盟带来的冲击。
- [3] 同一个西原正,在第175页和第184页还分别被误译为西原正士和西原仁,连同下文将谈到的第四类错误,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翻译态度的问题了。
- [4] 永田町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临近皇宫,为日本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的所在地,一般用来指代首相官邸和日本政界。
- [5] 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M],(于铁军、孙博红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 [6] 笔者当然同意,粗制滥造的翻译和一味阿谀的书评不是学术。
- [7] 陈乐民:《文心文事》[M],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4页。

作者简介: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01-10-16